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

——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

戚其章

提 要：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大亚细亚主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将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幕末时期的“攘夷”论和明治维新后的“兴亚”论联系起来，以证明其“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是不恰当的。大亚细亚主义乃是萌生与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指导其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策略或手段的侵略理论。

关键词：攘夷论 兴亚论 大亚细亚主义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大亚细亚主义是一个非常需要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大亚细亚主义，又称大亚洲主义，论者亦称之为泛亚洲主义或日本亚洲主义。国人之评论大亚细亚主义，始于李大钊。早在1917年，他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针对日本国内某些人倡导大亚细亚主义，指出其真实目的是：“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① 1924年11月，孙中山由上海北上经过日本神户时，应邀命题做《大亚洲主义》讲演，曾婉劝日本当局“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且勿推行“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做西方霸道的鹰犬”。^②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研究大亚细亚主义者渐多，主要分为肯定与否定两派，前者认为大亚细亚主义是“明治时代缘于西欧列强侵略东亚的危机感，以此为契机而形成的日本使命感”，^③ “号召亚洲各民族团结起来，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④ 的理论，是进步的；后者则认为大亚细亚主义是鼓动“为了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亚洲各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⑤ 乃“揭橥亚洲诸民族解放的共同体理论，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理论支柱”，^⑥ 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又有论者调和其间，提出一种部分或基本肯定的见解，认为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大亚细亚主义不能全盘否定，对其早期还是应该

①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0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409页。
③ 藤井昇三：《日本の大アジア主义论》，《孙文の研究》，劲草书房，1983年，第212页。
④ 新村出编《新辞苑》，岩波书店，1982年，第1981页。
⑤ 野原四郎：《大亚细亚主义》，《亚细亚历史事典》卷6，平凡社，1971年，第6—7页。
⑥ 原田胜正：《大アジア主义思想形成への展望》，《历史学研究》第229期，岩波书店，1959年3月，第63页。

肯定的。如盛邦和教授即撰文称：“日本的亚洲主义，其中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①此观点新则新矣，然笔者实难苟同。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大问题。兹不揣谫陋，对日本大亚细亚主义试作探析，以就正于学界。

一 “攘夷”论不足为大亚细亚主义“进步”说之据

为了证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盛文提出了一个“早期亚洲主义”的概念，以作为立论的主要根据：“对于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我们主要应该肯定其团结亚洲以抗西洋的‘亚洲同盟思想’。其‘中日提携’论出于当时侵亚论形成之际，独标一帜，诚属难能可贵，应在亚洲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适当历史地位。”此说能否成立呢？答案是否定的。

盛文对于“早期亚洲主义”的产生时间，即所谓“早期”究竟早到何时，始终未做明确的界定，只是含混地指出：“早期亚洲主义”出现的背景，乃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尊王攘夷思想的发生、征韩论以及亚洲侵略论的一时‘退潮’，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以及‘合纵连横’的策略考虑，诸种因素合于一道，遂使日本的‘亚洲主义’初潮涌现”。根据这段叙述，可以看出，盛文是把“早期亚洲主义”的思想渊源追溯到了幕末时期的“攘夷”论。在盛文看来，“早期亚洲主义与攘夷论有着重要的内在思想渊源。”因为二者都主张“中日提携”，而且“亚洲主义最初锋芒所向，主要指向西方列强”。其实，“攘夷”论与大亚细亚主义，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产物，各有其独自的形成背景和特殊的内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确实，“攘夷”论含有“中日提携”的观点。早在1825年，幕末的水户派学者会泽安（正志斋）撰《新论》一书，提出了“攘夷”的理论。其中，主张以“富国强兵”为要务，并在“攘夷”的同时争取中国的支持。他指出：“与‘神州’唇齿而相依者，清也。善处其势，巧应其变，内而设守御之备，外而施伐谋伐交之计，惟在乎选任将相得其人也。”《新论》所提出的理论，成为幕末攘夷运动的经典，“中日提携”论也就成为“攘夷”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了。盛文所提到的“早期亚洲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平野国臣，就是《新论》的忠实读者，也是会泽安的热烈崇拜者。他于1863年撰成《制夷础策》，即进一步发挥了会泽安的“提携”论的观点，认为：日本与中国，“地势连邻，风气相类，是以气禀颇同，发眼无异，古来即有通问之好。地同之国，相与谋事可也。”建议“遣使于清，谒其王，说之理，示之策，两国相与合力，一其志，断然不与毛夷寸尺之地，逐诸洋外，彼则失其便利。此即为伐谋伐交之计也”。^②于此可见，会泽安也好，平野国臣也好，都是把“日中提携”当作一时的“伐谋伐交”的策略或手段，并未视之为“攘夷”论的中心内容，是不宜评价过高的。

必须看到，幕末时期“攘夷”论的内容虽然相当驳杂，但“皇国至上”的“尊皇”论却始终是其理论支柱。会泽安在《新论》中论述他的国体观时写道：“天祖肇建鸿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经纶天业，细大之事无一非天者……天胤之尊，严乎其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义以明矣。”与会泽安志同道合的另一位“攘夷”论者藤田东湖，于1844年受到免职处分后闭门著述，曾撰有《弘道馆记述义》一书，亦强调“夫尊皇室，攘夷狄，文武之最大者。”又作《正气歌》称：“神州谁君临，万古仰天皇。皇风洽六合，孝敬事天皇……生当雪君冤，纲复更维

①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以下文中凡引盛文之处，不再一一注明。

② 河原宏：《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认识》，第三文明社，1976年，第24页。

张；死作忠义鬼，极天护皇基。”^①既然“攘夷”论者视日本为“神国”，乃“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就必然要主张“皇化”万国，“使海外诸蕃来观德辉”^②了。所以，会泽安由“尊皇”论引出“富国强兵”的构想，本来是很正常的，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主要的问题在于，他的“对抗‘外夷’的‘富国强兵’说，不是单纯主张防御‘外夷’，而是要对外采取积极攻势”，以至“开拓领土”。^③平野国臣也亦步亦趋，撰《神武必胜论》称：“今决意远征，奋发图强，必能克敌制胜……神国武威耀辉海外，皇统之神脉中兴，制驭万国于永远。”^④这样，“攘夷”论者在本来“富国强兵”的正确道路上走得过远，其性质也就发生根本变化而走向反面，从主张对外敌入侵的自卫变为鼓吹对外侵略了。

“攘夷”论者的“富国强兵”思想带有对外侵略的因素，并非偶然，而正是历史传统给“攘夷”论留下的胎记。自江户幕府建立以来，在学者中间鼓吹海外扩张者颇不乏人。及“攘夷”论兴起，“海外雄飞”^⑤论也就相伴而生。如盛文提到的“早期亚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佐藤信渊，就是一位激烈的“海外雄飞”论者。1823年，佐藤撰《宇内混同秘策》，竟狂妄地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故能合并世界各国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⑥并提出：“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而征服中国，必先取“满洲”。因为“凡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在他看来，只要征服了中国，世界各国必纷纷来归，“中国既入版图，其他西域、暹罗、印度诸国，侏离鸩舌、衣冠诡异之徒，渐慕德畏威，必稽顙匍匐，隶为臣仆。”^⑦有日本学者尖锐地指出，佐藤的“宇内混同”论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海外扩张计划的“原型”。^⑧诚哉斯言！

幕末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的思想特色，就是“以尊皇攘夷论为基础的国体观”，其“对外政策论基本上是对佐藤信渊《宇内混同秘策》的继承”。^⑨吉田也强调乘隙富国强兵，先对弱国下手，夺占易攻之朝鲜和中国。他在给其兄长杉梅太郎的信中写道：“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⑩他的“失诸俄、美，偿以鲜、满”的“补偿”论，正是其后日本喧嚣一时的“征韩”论之先声。

早年作为“攘夷”论者的胜海舟，更是一位激进的“海外雄飞”论者。盛文将他列为“早期亚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因为他讲过与亚洲国家“合纵连横”的话。《海舟日记》1863年4月2日记他对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和对州藩的大岛友之允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应由我国派出船舰，向亚洲各国君主游说合纵连横，共同壮大海军，互通有无，研究学术，免受

① 伊文成等主编《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50—52页。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47页。

③ 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91年，第27—28页。

④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原书房，1933年，第10页。

⑤ 大畑笃四郎：《日本外交政策史の展开》，成文堂，1983年，第71页。

⑥ 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第37页。

⑦ 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检证》，收入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

⑧ 大畑笃四郎：《日本外交政策史の展开》，第105页注11。

⑨ 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第43、49页。

⑩ 吉田常吉、藤井省三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卷54，岩波书店，1978年，第193页。

西洋的蹂躏。应首先说服邻国朝鲜，其次是中国。”^① 据此，盛文解释道：“胜海舟较早倡导‘亚洲同盟论’，主张唤醒亚洲，起而抗击西方侵略……宜由日本、中国与朝鲜结成三国同盟，‘合纵连横以共抗西洋’。”这种理解是否符合胜海舟的原意，颇值得研究。胜海舟所说的“说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既然只是“游说合纵连横”，何需“派出船舰”？其实，这正是胜海舟所设想的实现日本“海外雄飞”的杀手锏。他曾提出一个庞大的建设海军的计划，“足以退而守国内，进而攻敌国，终成东海一大强国，与西洋各夷争天下之要冲”。^② 这样，“派出船舰”的目的就十分清楚了。其实，胜海舟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他因感“派出船舰”的建议遭到“俗吏”的反对，非常失望，向大岛友之允抱怨道：“征韩之议，因循不决，叹息时机之将失。”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他笔下的“说服”不过是“征服”的同义语而已。所以，日本已故历史学家井上清评论说：“胜海舟的意见，总的说来，不外是先向朝鲜提议建交和结盟，如不听从，就征服它。”^③ 连黑龙会所编纂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也承认：“胜海舟早在文久年间（1861—1863）即抱海外经略之雄图，主张扩张海军，经略朝鲜，在其处设立根据地，渐向中国扩展，以称霸东洋，与欧美诸国对峙。”^④ 胜海舟作为继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之后鼓吹“海外雄飞”的一位急先锋，早已成为论者的共识。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产生于幕府末期的说法，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攘夷”论与大亚细亚主义存在某些相似的外在现象，并不能就说是二者“有着重要的内在思想渊源”。当然，“攘夷”论也有其两重性：一方面，它“并非丝毫都没有进步思想”，“也部分反映了人民对外独立平等的要求”，“包含有保卫民族与爱国主义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却欲以抗西洋之名行侵略朝鲜、中国之实，即包含着“夺取朝鲜和满洲土地的阴谋以及内心企图加以征服”的侵略图谋。^⑤ 后者的危害性及恶劣影响至为深远，这已经为历史的发展所证明，切不可熟视无睹，漠然置之。所以，盛文截取“攘夷”论者“提携”、“合纵”等片言只语，试图以此来说明大亚细亚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并不足为据。

二 “兴亚”论难证大亚细亚主义“进步”说

如果说幕末时期“攘夷”论大为盛行的话，那么，到明治政府成立以后却逐渐为“兴亚”论所代替了。

19世纪70年代，日本又有人重新拣起“攘夷”论者的“合纵”说或“提携”说，加以鼓吹，认为是“兴亚”的惟一之途。随之“兴亚”思潮高涨，形形色色的“兴亚”论或“兴亚”策在日本国内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1893年，樽井藤吉出版了它的那部颇有争议的著作《大东合邦论》。盛文将樽井列为“早期亚洲主义”的最后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就是说，在盛文看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迄于甲午战争前夕，在此期间所出现的各种“兴亚”论，都应该包括在“早期亚洲主义”的范畴之内，肯定其“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人们会问：“兴亚”有什么不好？主要的问题是，对于“兴亚”一词，不能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同样，对“兴

①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中译本，第8页。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第285页。

③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第8—9页。

④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10页。

⑤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第9、11页；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中译本，第52页。

亚”论的认识，也决不能简单化，而必须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

盛文之所以给予“兴亚”论以肯定的评价，是对“兴亚”论的产生背景的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

一是对“征韩论”之争后日本对外方针的认识发生偏差。盛文写道：“由于西乡（隆盛）等人的下野（1873年），此期‘征韩论’等侵略理论才暂时收敛，遂使‘亚洲主义’在日本国内获得较大的舆论空间。”其实，这个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征韩论”之争，并不能归结征韩派与反征韩派之争。恰恰相反，双方所争的不是征韩与不征韩的大原则问题，而是对征韩的时机把握的策略问题。所以，所谓“征韩论”之争，只不过是“征韩论”者内部的急征派与缓征派之争而已。^①事实上，“征韩论”之争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由于明治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并未改变，因此“征台论”又随后在日本高涨起来。1874年，日本悍然发兵入侵台湾，以此为起点，开始了近代日本侵华七十年的历史。1875年，日本又派军舰侵入朝鲜领海和内河，并以兵戎相向，制造了“云扬号事件”，借此强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这标志着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第一步，从此它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行其侵略大陆的政策。可见“侵略理论”在日本国内不曾有一时一刻地“收敛”，那种认为“兴亚”论是在日本“侵略理论暂时收敛”的背景下产生的意见，是缺乏根据的。

一是把“兴亚”论的产生看作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推动的直接结果，即将“民权”论与“兴亚”论挂起钩来，也是不妥的。盛文写道：“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曾为亚洲主义创造了较好的生存条件。1863（1873?）年，启蒙主义团体‘明六社’发起，积极宣传西方民权思想，开展‘开明’与‘渐进’的启蒙运动。板垣退助等人建立爱国公党，提出开设国会的要求。自由民权运动的产生，使日本思想界的注意力转向国内改革，原来对外侵略的嚣张色彩暂时淡化，无形中助长了亚洲主义的发展。”其实，当时民权论者的队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主张也时有变化，或先讲民权，后又转倡国权，如“明六社”的西周、加藤弘之、福泽谕吉等即是；或对内讲民权，对外讲国权，如爱国公党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江藤新平等即是。而且后一种倾向逐渐成为运动的主流，居于主导地位。1875年，在熊本成立的民权组织“雾月社”宣称其宗旨：“基于维新之誓文，组织公议舆论之政体，扩充民权，向海外扩张国权。”1878年重建的“爱国社”在全国大会上通过一份《合议书》，亦宣称其奋斗目标是：“要使个人伸张自由之权利，尽人人本分之义务，小而保全一身一家，大而建立维持天下国家之道，终而增进天皇陛下之尊荣福祉，使我帝国立于欧美各国对峙之地”。^②不仅如此，有些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事实上却是极端的国权主义者。如江藤新平提出《支那南北两分论》，主张“日俄提携”，先吞并朝鲜，再共同瓜分中国。“宜先与俄国提携，将朝鲜收下，进而将支那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将北部让给俄国，将南部收归我日本所有。以十年为期，在支那内地敷设铁路，待经营就绪，即驱逐俄国，圣天子迁都北京，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③副岛种臣则提出《大陆经略论》（又称《大陆进出意见》），指出：“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远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欲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④可见，许多民权论者都是以海外扩张作为“兴亚”的手段的。就是说，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对外侵略的思潮

① 戚其章：《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② 赵军：《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54页。

③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578页。

④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88—89页。

不但未曾减弱，反而日见嚣张。说“兴亚”论兴起之时，正是“原来对外侵略的嚣张色彩暂时淡化”之际，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还要看到，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开展的同时，确实有一些“合纵”论者或“提携”论者活跃起来。其著者有冈本监辅、宫岛诚一郎、曾根俊虎等人。冈本后曾为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一书作序，其主张始为时人注意。其实，早在1873年，他就认为：“当此欧美各国觊觎东亚之际，日清两国以合纵为急务。”并以唤起“清国朝野之觉醒为志”。1875年，他亲自来到中国，周游北京、东北、华中各地，以“日清合纵论”向朝野游说。当时刚发生日本发兵侵略中国台湾事件，国人皆对日本怀有戒备之心。他的游说并无多大效果，反而引起听者的反感和警惕。他有诗记其事云：“周游三万里，慷慨思报国。畸迹人怪异，呼为狂夫魁。”^①其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冈本是有日本军方背景的，他的中国之行就是受陆军省参谋局的嘱托。于此可知，他以“合纵”论来华游说，其实是奉有秘密使命的。

宫岛诚一郎曾任日本左院少议官，又转任修史馆御用员，却以汉学家的身份与清朝驻日外交官密切交往。当时，日本羽翼尚未丰满，他“关注东亚形势，深感邻邦亲善之重要性”，要“兴亚”必“日支提携”。认为：“方今欧洲各国气焰，~~翼翼~~乎对亚洲压迫愈紧，恐不出数年，我东洋之中必出现一大波澜。盱衡亚洲全局大势，惟有日支两大国加以联络，以维持大局。”^②1877年，清政府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莅日，与宫岛开始交往，不时进行笔谈。宫岛亲笔写道：“贵邦与敝国唇齿相持，真兄弟之国也。近年西洋气运旺盛，汽车、汽船之（及？）电线消息相通，才有衅隙，忽开兵端，吞噬无止时。今东洋幸无事，岂无安逸怠傲之戒乎？两大国宜以此时益厚交谊。”何出于外交礼仪，表示赞同，亦写道：“尊论是，报利。以亚细亚洲论，惟我国与贵国形势最近，交亦宜倍亲。”^③此时，日本正加紧吞并琉球的步伐，何如璋持节来日的主要使命就是交涉琉球问题。笔谈之后，宫岛立即将笔谈稿呈交力主吞并琉球的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足以说明他是以联络友好为名来窥探中国官方对琉球问题的态度的。当时，日本对外政策的重点是防俄，对大陆的侵略扩张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准备过程，所以对中国屡示友好之意。1876年，副岛种臣来华时，即向李鸿章郑重表示，日本“防俄之吞噬甚切，其愿与中国并力”。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也向李鸿章信誓旦旦：“实虑俄人南侵高、日地界，方欲与中国、高丽并力拒俄，岂肯同室操戈，自开衅隙？”^④所以，宫岛秉承日本政府的意旨，在探听中国动向之同时，还规劝何如璋：应以防俄大局为重，区区琉球争之何益？其赠何之长诗有云：“琉球眇眇小岛耳，呼藩称县固无妨。由来瓯脱不争可，纵彼属我又何妨？”^⑤其巧言饰辩真是达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

与冈本监辅、宫岛诚一郎相比，曾根俊虎的身份更为特殊，不仅是海军的现役军官，而且有在中国从事谍报活动的经历。他还编有《支那近世乱志》、《诸炮台图》等书。事为明治天皇睦仁所闻，特御前召见，使其受到莫大鼓舞。1877年，他先是组织“振亚社”，声称：“今欲振兴亚洲，惟合纵一策耳。”^⑥1880年，又创立“兴亚会”，以在外务省任职的长冈护美为会长。该会所宣布的宗旨是：亚洲各国须“合纵连横，心志相通，缓急相扶，苦乐相共”，以“挽回我

① 中岛真雄：《统对支回顾录》下卷，大日本教化图书株式会社，1941年，第127—128页。

② 中岛真雄：《统对支回顾录》下卷，原书房，1936年，第1463—1464页。

③ 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华书局，2003年，第10页。

④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6，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⑤ 中岛真雄：《统对支回顾录》下卷，第1465页。

⑥ 兴亚会编《兴亚会报告》第1辑，东京，1880年3月发行，第4页。

亚细亚衰颓萎靡大局”。^① 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对“兴亚”二字颇为赞赏，致函称：“尊会名为兴亚，会意甚美。”^② 耐人寻味的是，明治政府的一些高官，如柳原前光、榎本武扬之流，也都被拉入该会。柳原曾任外务大丞，是一个大陆扩张论者，曾建议加紧侵略朝鲜的步伐，称：“朝鲜国为北连满洲，西连鞑清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③ 榎本比柳原更为激进，曾以海军中将担任驻俄公使，于1878年夏离任归国途中，绕道新疆进入中国，并游历沿海各省进行调查，归国后撰成《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一书。内阁顾问黑田清隆到中国实地考察后，对此书的评价是：“其山川险要，人情土俗，无不详载。今夏请假游历中国，按册而稽，俱无错误。”从此极力主张早日进攻中国，称：“宜在此一二年中，速取朝鲜，与中国一战，则我地可辟，我国自强。”^④ 由此可见，尽管曾根俊虎组织的“兴亚会”，高唱亚洲各国“心志相通，缓急相扶，苦乐相共”、“振兴亚洲”等动人曲调，然从它的主要成员看，其包藏祸心业已昭然若揭。最有趣的是，积极主张“征亚”的榎本武扬，后竟接替长冈护美成为“兴亚会”的第二任会长。这对于欣赏“兴亚”二字的黎庶昌等人来说，确实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兴亚”与“征亚”，本是日本海外扩张论者对外政策所准备的两手：名为“兴亚”，实欲“征亚”。亦即所谓“兴亚”其表，“征亚”其里也。不少中国官员及著名人士炫于“兴亚”之名，亦为之附和。除黎庶昌外，黄遵宪在“兴亚会”成立后有《呈有栖川炽仁亲王》诗云：“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自潜匿。”^⑤ 就连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也有《赠宫岛诚一郎》诗云：“同合车书防外侮，敢夸砥柱作中流。”^⑥ 他们都对“兴亚会”存有期待，其心情可以理解，无奈只是一相情愿而已。宫岛诚一郎的情况已如上述；有栖川炽仁亲王后来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则以参谋总长充任大本营幕僚长，成为侵华的元凶。所有这些，都是黄、丁等人当时不可能料想到的。

在日本官方的大力扶持下，“兴亚”组织林立，“兴亚”思潮日渐高涨，便成为很自然的事情。1884年，中法战争的战火燃烧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给“兴亚”论者提供了绝好的大展身手的机会。于是，他们拟订了两项计划。

其一，策划长江流域的哥老会起事，造成中国全国的混乱局面，以便趁机渔利。此计划由福州的浪人组织“福建组”（以庐山轩照相馆为掩护）提出，认为中国外则强敌压境，内则伏莽遍地，此刻联络会党起事，登高一呼，天下必云集响应，清国将土崩瓦解，诚“改造中国之良机”。^⑦ 此计划得到了在上海执行“特别任务”的海军大尉曾根俊虎的大力支持。但由于中日《天津条约》的签订，此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便宣告寿终正寝。

其二，在上海创办东洋学馆。盛文认为，此举是一批“兴亚”论者认识到有“对清国人进行教育的必要”，要对中国“施行文明输出的计划”。其目的是否如此呢？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东洋学馆是在玄洋社的积极支持下才创办起来的。学馆筹办者之一的日下部正一曾向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游说：“上海乃东洋要港，在此地创办学校，培养通晓中国语言和国情的有志

① 兴亚会编《兴亚会报告》第2辑，东京，1880年4月发行，第4页。

② 兴亚会编《兴亚会报告》第28辑，东京，1882年5月发行，第7—8页。

③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卷3，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53年，第149页。

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0，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2—3页。

⑤ 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47页。

⑥ 中岛真雄：《对支回顾录》下卷，第1466页。

⑦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315页。

青年，极有必要。”平冈感到此计划与玄洋社的“大陆经纶”设想正不谋而合，非常赞同。玄洋社的总代表头山满对此计划也十分肯定，指出：“若先取大者，则小者可不劳而获；若先取中国，则朝鲜可不招自来。故与其先向小小的朝鲜下手，不如先处置庞大的中国。”于是，派包括樽井藤吉、杉田定一在内的一批“兴亚”论者七人亲自来到上海选择馆址。此时，他们想像着未来将“唤起风云骤起于大陆”，竟得意忘形地宣称：“清国政府已经腐败透顶，将其颠覆则若摧枯拉朽，有吾辈七人足矣。”^①于此可见，“兴亚”论也好，“大陆经略”论（“征亚”论的另一种说法）也好，尽管挂出不同的招牌，其包装的形式也时有变化，但内里的货色却是一路的。东洋学馆的开设虽为时不到一年，但其作用却不容忽视，后来有当事人回顾当年时称：“本学馆存在日期虽如此短促，但它开天下风气，启迪后继的功绩，实在是不可磨灭的。”^②

确实如此。从此时起，鼓吹“兴亚”论的人大都成为积极行动型的“大陆经略”论者，纷纷来华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在这里，决不应忽视副岛种臣所起的作用。副岛对当时各种“兴亚”议论强烈不满，认为容易产生误导，才提出《大陆经略论》，明确指出“大陆经略”才是“兴亚”的关键所在。并强调说：“此外别无他途。此非师出无名，依靠战争使国家强盛，系确保国家独立之道，亦系对君主尽忠之道，故必须认为此乃国家之正理。”副岛的这套“大陆经略”理论，在当时的日本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日本长崎青年浦敬一，本来相信“日支提携”能够防御欧洲侵略，以确保东亚和平。后出入副岛之门，幡然醒悟，改变了原先的主张，开始认识到：“支那诚中原逐鹿之地，疾足多力者得之……早一日确立略取支那之策，以免日本卧榻之旁闻他人鼾声。”^③于是，他独自挺身西航，以从事大陆之“经略”。连研究水户学的学者佐佐友房，激赏副岛之论，也撰《东亚经纶》一文，鼓吹日本有志之士应将眼光转向国外，实行海外扩张，“以护持皇室于无穷，宣扬国威于八表”。^④其要图就是“经略大陆”。

佐佐友房是“兴亚”论发展中的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既继承了副岛种臣的“大陆经略”理论并加以进一步地阐述，又亲自培养了一批决心以“大陆经营”为己志的行动型“兴亚”论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人是荒尾精和宗方小太郎。

荒尾精本是日本陆军的现役军官，却时刻对中国的“四百余州魂牵梦萦”，甚至不惜欲放弃军职前往中国。^⑤他曾亲谒陆军卿大山岩，陈述去中国的志向。大山问：“你去中国的目的何在？”荒尾答道：“取得而统治之，以便振兴东亚。”^⑥其后，他还着重于理论方面的宣传，一面宣扬“皇国精神”，撰有《宇内统一论》；一面鼓吹“大陆经略”，撰有《兴亚策》。《宇内统一论》与《兴亚策》，二者互为表里，是相辅相成的。荒尾在《宇内统一论》中极力赞美日本的“万世一系”，宣称：“在宇宙内只有我国拥有万世一系的皇室，我国所以具有完美的国体，乃是上天之意，也是上天特别眷顾我国，故完成一统六合，奄有四海之宏猷远谟，是为上天赋给我国的天职”。在《兴亚策》中则提出：日本应“内振纲纪，外宣威信，使宇内万邦永远瞻仰日本皇宗之懿德”，以“换回东亚之颓势，重振东亚之声威”。并强调：日本一旦将中国掌握手中，“以其财力，养一百二十万以上之精兵，配备百艘以上的坚舰而绰绰有余，若再将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尚文风气相融合，并行不悖，辅助而进，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宣示亚洲之

①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310—318页。

②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译本，第182页。

③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88—89、91页。

④ 中岛真雄：《对支回顾录》下卷，第355页。

⑤ 中岛真雄：《对支回顾录》下卷，第464页。

⑥ 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左久良书房，1910年，第12页。

雄风于四海。”他于1886年春在汉口设立乐善堂支店，自任堂主，就是看中了汉口的地理位置和形势。其地与汉阳、武昌成鼎足之势，位于中国中枢之区，地当要冲，成为九省之会，可作为未来“兴亚”的策源地。将来一旦取得两湖及豫、川、陕等省，以其人口之众，财富之饶，足以号令天下。^①怪不得后来宫崎滔天把他这一套“兴亚”理论称为“占领中国主义”。^②

宗方小太郎更是在佐佐友房直接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行动型的“兴亚”论者。佐佐对宗方的赠言是：“以君子之心，行英雄之事，文武一致，刚柔兼济，以护持皇室于无穷，宣扬国威于八表。”并鼓励他“终始生死，从事于兹”。^③宗方不负佐佐所望，于1884年来到中国，后来则参加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活动，并主持北京及天津支部的工作。他鉴于“我亚细亚洲幅员之大，生民之聚，物产之富，实为彼欧洲之数倍，而受白人之凌辱如斯者，虽曰天运，抑又有人事所未尽者”，认为当务之急是“为邦家策划远谋”。其“兴亚”策之要有三点：其一，“惟有视亚洲如一家，为亚洲之事如为我之事，在于以复兴自任，以兴其大局谋求帝国之安全。古人曰：以四邻守国。予亦曰：欲救邦国今日之急以谋无穷之独立，宜立于日本以外之地，在于兴日本以外之地，以修邦家之藩篱，希求邦家之无事。”其二，“中国之隆替有关亚洲全局之休戚最切，是以欲兴亚洲，非先兴中国不可。是乃形势之不得不然者也。今视中国之情况……犹如病入膏肓，虽有扁鹊亦不可治之……无宁假借事端之名义，出兵与之作战，以取而代之。”其三，“中国获得振兴后，可打破亚洲各国之酣睡，使其知晓大义之所在，养其国力，鼓其元气，以驱逐彼贪婪无厌、横暴狼戾而长期在我亚洲地域上跳梁跋扈之残暴欧洲人。是乃兴亚之第一着也。”^④宗方的“兴亚”理论是对荒尾精《兴亚策》的重要发挥，也可称得上典型的“占领中国主义”。

盛文将樽井藤吉列为“兴亚”论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应该是对的，但对樽井的《大东合邦论》所做的十分肯定的评价：“他的‘合邦’理论……主张‘和平的’与‘无私公平’的合邦，以恢复‘东洋的势力’，主要论说日本与朝鲜的联合。此与当时准备侵略中朝的日本政府站在不同的立场之上，实质是提倡亚洲和平的联合”，就值得考虑了。《大东合邦论》初稿写于1885年，1893年再加修改，先在《自由平等经纶》杂志连载，后合为一册付梓问世。其基本观点是：“我日韩宜先合，而与清国合纵，以御异种人之侮。”^⑤那么，日本与朝鲜怎样“合邦”？又合成什么样的邦呢？樽井写道：“抑合邦也者，协约立国，以合各邦，使各邦人民得参其合成一统国之大政者也。而其要在使各邦自主自治之权，归于均平……两邦不行其权，而其合成国专行其权，亦使两邦人民均得参听其大政，则彼此平等矣。”^⑥所述“合邦”之法极其模糊，使听者不得要领。试想：既然“两邦不行其权”，而由“其合成国专行其权”，那么，这个“合成国”由谁来主导？这内中恐怕有不便明讲之处。所以，井上清称其为“似是而非的联合论”，实际上是“成了以日本为‘盟主’的‘联合’”^⑦的理论。其实，在日朝两国关系上，使用“自主”、“平等”等词，并不是樽井的创造。早在1876年2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的《日朝修好条约》（或称《江华条约》）12款中，其第1款即明确规定：“朝鲜国系自主之邦，保有同日本国平等之权。”然而，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因其第4款及第5款规定朝鲜先后向日本开放釜山等

①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364—365、361—362、343页。

②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平凡社，1976年，第41页。

③ 中岛真雄：《对支回顾录》下卷，第344页。

④ 宗方小太郎：《狂夫之言》，收入吴绳海、冯正宝编译《宗方小太郎与中日甲午战争》（未刊稿）。

⑤ 中岛真雄：《对支回顾录》下卷，第355页。

⑥ 森本（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明治二六年（1893）刊，第127页。

⑦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译本，第133页。

三处口岸，第10款允许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等条文，实际上已是对第1条“自主”、“平等”规定的具体否定，乃是一个严重不平等的条约，“成为永久束缚朝鲜的桎梏”。^①其后，日本又通过1882年的《济物浦条约》和1885年的《汉城条约》，从朝鲜获得许多利权，甚至取得了汉城的永久驻兵权，给朝鲜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如果樽井真的主张日本与朝鲜平等“合邦”的话，那么，他怎么可能对日本已经加给朝鲜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给予严厉的批评，反而讳莫如深呢？况且，此时日本早已与琉球实现了“合邦”，明治政府并未让琉球享有“自主”、“平等”之权，樽井也视而不见。正如信夫清三郎所指出的：“对处分琉球的历史视而不见，怎么能把日韩两国的合邦置于合理的基础之上呢？又如何保证日朝两国的合邦不会成为对朝鲜国的合并‘处分’呢？这种设想，不是以对历史和现状的精确分析作为前提，反而包藏着隐匿真相的危险。”^②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带有十足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是不能单纯从字面上去了解它的真实含义的。其实，“合邦”者，“吞并”之代称也。盛文惑于《大东合邦论》动听诱人的漂亮词句，而不结合历史和现状进行精审的研究分析，便给予充分的肯定，是不可取的。

由上述可知，从19世纪70年代中叶，迄于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是“兴亚”论在日本国内兴起以至泛滥的时期，对其内容的表述尽管因人而异，甚至大相径庭，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实都是以“大陆经营”为根本出发点，是毫无可肯定之处的。盛文试图以“兴亚”论证明大亚细亚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 大亚细亚主义萌生及形成的历史背景

盛文认为，大亚细亚主义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就产生了，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先在文化领域“发生右转异化与可悲的变数，演化为亚洲侵略与‘大陆政策’的文化理论源头。这种‘异变’恰与日本加紧实施‘大陆政策’与亚洲侵略政策前后一致”。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大亚细亚主义固然与日本“‘大陆政策’与亚洲侵略政策前后一致”，但是反过来看，与日本“‘大陆政策’与亚洲侵略政策前后一致”的不一定就是大亚细亚主义，并不能以此证明大亚细亚主义本身“发生右转异化与可悲的变数”。

应该看到，从1873年发生“征韩论”之争以来，日本明治政府始终处心积虑地推行“大陆经略”政策。所谓“征韩论”，其实质就是侵略大陆论。^③188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甲申政变失败后，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福泽谕吉在《时事时报》上带头“主张立即对清开战，说要准备天皇的亲征”。犬养毅等人则鼓吹趁机“干涉朝鲜内政，努力实行吞并”，并向日本当局献策说：“与中国之纠纷，乃吾等为国家所最希望者也。”^④此后，日本更加紧了对大陆的作战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多种大陆作战方案。其中，以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草拟的《清国征讨方略》最为著名。它提出日军对华作战的总目标是“先攻占北京，擒获清帝”，将中国分割为六块，然后分别处置之。并指出：“东洋命运关系清国兴亡者颇多。若万一清国成为他国蚕食对象，我国命运亦不可料。莫如为使欧洲不致侵入，我国先主动制定

①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5—6页。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262页。

③ 戚其章：《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18页。

④ 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译本，第76—77页。

统辖清国之方略。”^①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发表《外交政略论》，提出本国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之外侧，还要有一条“利益线”，那就是“势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地区”。还特别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② 于是，所谓“利益线”之说，便成为尔后日本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理论”根据。这样看来，甲午战前“兴亚”论的发展历程，确实是与日本“‘大陆政策’与亚洲侵略政策前后一致”的。正因为如此，认为大亚细亚主义早在甲午战争以前产生，而后来“发生右转异化与可悲的变数”的说法，就很难站得住脚了。

对比一下甲午战争以前和以后日本主张对华侵略扩张的思潮，可以明显地看出，甲午战争恰似一条巨大的分水岭，将二者区分开来。尽管它们都是要实施“‘大陆政策’与亚洲侵略政策”，这是其共同性；但它们却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即前者是以直接“占领中国”为目标，而后者则是企图通过“保全中国”的手段来最终达到“占领中国”的目标，这又是其各自的特殊性。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将大亚细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兴亚”论加以区别，也就无法真正认识大亚细亚主义。所以，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潮只能是萌生于甲午战争之后，而不会是在此之前。

甲午战前，“占领中国主义”之所以在日本盛行，是因为日本朝野对中国之现状已经有了切实的了解。通过亲眼观察中法战争的实况，日人小室信介写道：“中国国势日蹙，内政日弊，百官日怠，言路壅塞，贿赂公行，人心离叛，百姓怨积。一朝有事，匪徒蜂起。列强环伺，犹如俎上之肉。”^③ 宗方小太郎甚至认为中国只是徒具其形：“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壮其观瞻，外形虽美，但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灾，则柱折栋挫，指顾之间即将颠覆。”^④ 所以，近年在日本发现的1887年至1888年的日本海军提出的六份《征清方策》，都以攻占北京为作战目标。^⑤ 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时所制定的作战方针，也包含有进行直隶决战，攻陷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的计划。战争开始后，日军攻城略地，步步得手，而进行直隶决战的计划却被取消，令人不解。其实，这正是西方国家的态度所起的作用。当时，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John Wedderburne Kimberley）即曾向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提出“劝告”：“我担心若战争继续下去，向前推进，占领北京，从而可能导致清朝覆灭。随之出现的严重后果，几乎无需说明就十分清楚：整个中华帝国将陷于一切混乱状态。到那时，日本很可能找不到可以谈判的政府，使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⑥ 加藤立即致电向国内报告，引起日本政府的极大重视。对此，伊藤博文尤为担心，认为直隶决战之举“壮哉壮矣，又谈何容易”，指出：“设使如此，虽幸而达成其所望，然彼清国必满廷震骇，暴民四起，土崩瓦解，终必形成中外齐称之所谓无政府状态。时至今日，尽管我国竭力避免西方列国之干涉，但列国在各自保护其商民方面，由于最为深切之利害关系，

① 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36—237页。

③ 小室信介：《第一游清记》，日本东洋文库藏书，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246页。

④ 宗方小太郎：《中国大势之倾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127页。

⑤ 樱井规矩之左右等：《日本预谋发动甲午战争的一组史料》，《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第10—41页。

⑥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 5, 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 1894—1895*,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Bethesda, 1989, p. 57. 以下引用此书时简称 *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

势必导致不得不实施联合干涉，乃属必然也。此岂非自我招致各国之干涉耶！”^①日本开始认识到，它的对华军事行动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牵涉到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稍有不当，便有招致联合干涉的危险，实施“占领中国主义”谈何容易！

《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日本所拟之条约草稿有割取辽东半岛的条款。消息传出，欧美各国极为关注。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Mikhail Hitrovo）先是提醒日本外务省：“为日本之最大利益计，接受清国大陆领土之割让实非上策。”^②后则由外交大臣罗拔诺夫（Aleksei Barisovich Lobahov-Rosotvsky）约见英国驻俄大使拉塞尔斯（Frank C. Lasselles），请英国知照日本：“俄国反对日本拟议中的领土获得，当然会尽力加以阻止……一旦日本在大陆得到一块立足地，它便会得寸进尺，直到形成与俄国接壤之势。这自然是俄国所不愿看到的。”^③德国驻日公使哥屈米德（Baron Von Gutschmid）也向日本外务省口头通报：“日本要求中国割让大陆领土必将引起列强干涉。”^④日本心存侥幸，寄希望于外交上的纵横捭阖以化解西方的干涉。令日本未曾料到的是，《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俄、德、法三国便结成干涉同盟，反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日本政府终于明白，如无强大的武力及与三国一决胜负的决心，单凭外交上的折冲是无济于事的，无奈只好容纳三国之“忠告”，放弃对辽东的永远占领。当然，日本的放弃是并不甘心的。明治天皇睦仁即对伊藤博文说：“用不着急于夺取辽东半岛。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已经了解该地的地理、人情，不久将在朝鲜或其他地方再发生战争，那时再夺取也不为晚。”^⑤从此，日本继续扩充军备，并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为未来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而准备。无论如何，这再次提醒日本：“占领中国主义”是行不通的。

早在甲午战争胜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被宫崎滔天称作是典型的“占领中国主义”者的荒尾精，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在西方列强争衡中国的情况下，日本独自占领中国是不可能的，其对华的策略必须改弦更张。因此，他发表了经过反思后提出的《对清意见》，认为：虽然“在这次战争中，最后我将完全胜利”，但目前当务之急，不是颠覆清朝，而是“救中国于未亡”，并“使它振兴，以强我之唇，固我之辅，筑起实现兴亚大业的基础……由此我可常执东方之牛耳。”最后强调：“唇齿相依，鼎足相扶，以挽回东亚的大势，斥退西欧的侵略，乃我国之天职与所以启掖清国富强之本旨。”^⑥1895年9月，以荒尾麾下的原汉口乐善堂成员和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生为主要骨干，共148人，组成“乙未同志会”，并制订《规约》，宣布该会为“亲睦团体”，致力于有关“清国及其他东邦之事业”。^⑦1898年春，平冈浩太郎、陆羯南、犬养毅等人组成“东亚会”，宣布其宗旨是：“密切日清两国经济关系，巩固其基础，以期将来利益之发展扩张。”^⑧同年6月，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的“精神社”，又吸收“乙未同志会”加入，改名为“同文会”。到11月，“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组成新的组织“东亚同文会”，近卫笃磨出任会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同文会”的成立正值中国面临瓜分危机之际。日本一面努力使自

① 伊藤博文：《机密日清战争》，原书房，1967年，第66—67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卷28，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53年，第699页。

③ *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 p. 210.

④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卷28第1册，第709页。

⑤ 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第199页。

⑥ 荒尾精：《对清意见》，博文馆，1894年，第3—5、89页。

⑦ 佐佐博雄：《日清战争と通译官》，《日清战争と东アジア世界の变容》下卷，ゆまに书房，1997年，第387页。

⑧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608页。

己挤进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的行列，一面又为西方列强瓜分中国而日本则无所作为而担忧，处于两难的境地，必须将对华策略进行重大的调整。所以，在该会确定的纲领中提出了“保全支那”的口号，并声称其宗旨：“日清两国之交久矣，文化相通。风教相同。以情而论有兄弟之亲，以势而论则有唇齿之形。玉帛往来，自古不渝。皆因其出于天理之公、发于人道之正也，岂彼环列国朝婚夕寇、互相攘夺者同欤？何图前年昊天不吊，兄弟阋于墙，而列国乘隙，时局日艰矣。呜呼！忘愆弃嫌，以防其外侮，岂非今日之急务耶？当此之时，上须求政府执公尚礼，益益固其邦交；下须使两国商民守信共利，弥弥善其邻谊。两国士大夫则为其中流之砥柱，须相交以诚，讲明大道，以助上律下，同致强盛矣。此即我东亚同文会之所以设立者也。”^①近卫笃磨没有提出“大亚细亚主义”这一名称，但他的“保全支那”论却为大亚细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故冈田满指出：“‘东洋乃东洋人之东洋也’。挺身而倡此绝唱者，霞山公（近卫笃磨）是第一人也。首倡大亚细亚主义，呼吁亚细亚民族一致联合奋起，驱逐西欧诸国，严惩其粗暴、傲慢态度与侵略之野心，公之发言亦乃其第一声也。”^②他的话是有根据的。于此可见，“保全支那”论的提出正标志着大亚细亚主义的萌生。

近卫笃磨的“保全支那”论是以“人种竞争”说为立论根据的。他在“东亚同文会”成立前不久发表过《同人种同盟兼论支那问题研究之必要》一文，写道：“东洋之前途，终不免为人种竞争之舞台。纵令施一时之外交政略，而生出如何之态度，亦一时之变态耳。最后之命运，存乎黄白两人种之竞争。此竞争之下，支那人、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③用“人种竞争”来掩饰日本与西方列强争相瓜分中国的企图，是近卫的一大创造，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冈田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就是“人种竞争”说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发挥。^④他于1902年先后撰写了著名的《东洋的理想》、《东洋的觉醒》等文章，认为：“亚洲本为一体，喜马拉雅山脉两侧孕育了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孔子共同社会主义的中国文明和吠陀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但如今真正“继承亚洲丰富历史并对其一贯深入研究的只有日本”，所以日本负有复兴亚洲的责任。为此，日本“始终希望维持和平，万不得已诉诸武力，也是为了自卫”，“为明治维新的理想，为宝贵的古典文化遗产，为整个亚洲复兴的和平理想而战。”^⑤正如井上清指出，这“只不过是……中国瓜分论蒙上了一层黄种人反对白种人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面纱而已”。^⑥无论“保全支那”论也好，“亚洲一体”论也好，都是经过包装的侵略主义，怎么能给予肯定呢？

如果说近卫笃磨的“保全支那”论标志着大亚细亚主义萌生的话，那么，小寺谦吉于1916年发表《大亚细亚主义论》一书则标志着大亚细亚主义的形成。小寺在拼凑“保全支那”论和“亚洲一体”论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大亚细亚主义”这一名称，并将前二者的论点加以概括称：

① 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上），中华书局，1989年，第672—673页。

② 吉田毅明：《巨人头山满翁的话》，第115页，转引自赵军《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第100页。

③ 近卫笃磨日记刊会编《近卫笃磨日记》，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8—1969年，附属文书，第62页。

④ 盛文专辟一节论述“文化亚洲主义”，认为日本“再尊儒学，产生‘国粹派’，倡导‘日本主义’，在日本乃至亚洲现代文化建设史上具有值得肯定的历史意义”。这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观点。从总的方面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但这个问题涉及面甚广，需要进行专题讨论。这里只能就盛文所重点介绍的冈田天心的学说稍作评论。

⑤ 龟井胜一郎、宫川英雄编《明治文学全集 38·冈田天心集》，筑摩书房，1968年，第6、8、117、120页。

⑥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134页。

“中国与印度乃亚洲文明发源地，而日本乃承继亚洲之文明者也。”因为“保全支那”，“不特自我国自卫上言之，有当然者，即中国之命运概不可听其自然而放弃。”盖“援助中国以确定日本在太平洋之地位耳。为保全邻邦之义，而维持极东和平，是日本之根本国是也”。并强调中日“结合”是大亚细亚主义的核心：“大亚细亚主义之当面急务，所以先图中日两国之结合，以之为中心势力，而图黄色人种之繁荣，以当欧美列强之世界的帝国主义。”^①此论一出，日本国内响应者颇不乏人，引起李大钊的高度警惕，撰文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切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人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到那时亚细亚不是欧、美人的亚细亚，也不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简直就是日本人的亚细亚。这样看来，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②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井上清也对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揭示说：“不管反对白种人帝国主义的呼声多么逼真，也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与欧美帝国主义矛盾的表现，既不是亚洲的解放，也不是反对帝国主义。”^③他们之所论，庶可盖棺论定矣。

总之，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乃是一种指导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政策或手段的侵略理论。当然，在大亚细亚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有些关心亚洲前途和命运的日本人士主张“支那革命主义”，从政治上与大亚细亚主义分道扬镳，所以不应该将他们归入大亚细亚主义者的行列。不过这些人只占极少数，并不能改变大亚细亚主义的主流。所以，并不存在盛文所说的大亚细亚主义“最终‘右转’异变”的情况。

最后，还要指出的一点是，盛文写作的主观动机可能是好的，希望检讨大亚细亚主义发展的历史，“将有利中日两国人民树立正确的亚洲观与中日关系论，增进理解与合作，使中日关系日臻成熟，由此将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带入新纪元”。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一良好的愿望必须以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为前提。否则的话，必将事与愿违，产生负面的社会效果。这倒是论者应该千万警惕的。

〔作者戚其章，研究员。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50002〕

（责任编辑：姚玉民）

①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国百城书店，1918年，第138—139、145、180页。

②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文集》（上），第609—610页。

③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134页。

the major reasons why China was able to make an atomic bomb within ten short years. On the other hand, with Khrushchev's deep-seated distrust of Mao Zedong, particularly with the deepening Sino-Soviet disagreements in atomic strategy, atomic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USSR tried to limit and restrict its atomic aid. When the first signs of a split in Sino-Soviet relations emerged, the first thing to go was the USSR's atomic aid to China.

Discussion and Review

Exploring Japanese Pan-Asianism: A Discussion with Mr. Sheng Banghe Qi Qizhang (132)

Pan-Asianism is a significant topic for in-depth studies in moder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t is not correct to associate the notion with the exclusionism of the late shogunate period and the Meiji idea of a stronger Asia and thereby to prove that it had "objective and progressive elements." Japanese Pan-Asianism took form after the 1894-1895 Sino-Japanese War. As a product of Japan's march towards imperialism, it provided the country with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nvasion which underpinned its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counterbalancing the Western powers in Asia, particularly in China.

Review Essay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Fengjian* (封建) in Chin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y on the System of *Fengjian* Landlords Li Genpan (146)

Research Notes

Why Did Emperor Xuan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Appointed Suzong instead of Shouwang as His Successor? Ren Shiying (173)

Journal of Weng Tongh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anuscripts and the Published Version Kong Xiangji Yujiro Muratu (180)

New Books Abroad

Brett Sheehan: *Trust in Troubled Times*: Money, Banks,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Republican Tianjin Tao Jiye (188)